

广州文史第七十二辑

廣州文史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文史第七十二辑 / 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462-0056-9

I. 广… II. 广… III. 文史资料—广州市
IV. 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5364 号

书 名	广州文史第七十二辑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责任编辑	冯少贞
特邀编辑	刘育青
责任校对	蚁燕娟
封面设计	康 天
印 刷	广州市政协机关印刷厂 (地址: 广州市寺右新马路南三街五巷 1 号首层 E2 邮政编码: 510600)
规 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5
字 数	314 千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62-0056-9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顾 问：朱振中 李勤德 平欣光 张灼民

主 任：李齐念

副 主 任：杨麒祥 童元喜 孔淑仪 黄森章

编 委：李树青 王志雄 张嘉平 付广平

李齐念 杨麒祥 童元喜 黄建锤

孔淑仪（执行） 黄森章 吴 裘

刘育青 易宏谋 于 迅

主 编：李齐念

副 主 编：吴 裘

执行编辑：刘育青

目 录

杨尚昆两次为《番禺报》题写报头记略·····	张云峰 (1)
广州解放初参加旧报馆接管的回忆·····	鲁 阳 (3)
吴有恒与复刊之初的《羊城晚报》·····	鲁 阳 (11)
忆《羊城晚报》创刊·····	黄伟经 (20)
广州日报经营管理改革回顾·····	古志英 (22)
《广州日报》四版改八版的回忆·····	黄景仁 (37)
忆《广州日报》从八版到十二版·····	谢 烽 (43)
广州日报从吃国家补贴到成为纳税大户·····	古志英 (50)
《广州日报》的三落三起·····	谭国超 (54)
我所知道 1949 年前的《广州日报》·····	齐 炼 (61)
浅谈《广州日报·五层楼下》特色·····	张文藻 (64)
《广州文摘报》创刊 24 周年回顾·····	张文藻 (68)
《商旅导报》、《美食导报》比翼齐飞纪事·····	保延熙 (76)
忆《信息时报》艰苦创业十年路·····	吴明先 (84)
一句成功的广告词：信息时报有嘢到·····	吴明先 (91)
厚积薄发的广州《英文早报》·····	林 凤 (94)
《老人报》走过 25 年的峥嵘岁月·····	老人报社 (98)
舞台与广州日报的情结·····	黄榆敏 (113)
法制新闻的崛起与繁荣·····	苏仲衡 (117)
见证历史时刻 ——在采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日子里 ·····	郑穗平 (125)

记者与配角的趣闻趣事 潘广庆 (131)

记广州地区新闻界与台湾同行的两次交流 苏仲衡 (136)

挺身而出,秉笔直书

——从化温泉疗养风景区更美了 刘 军 (141)

幕后旧闻 罗远峰 (145)

接管广州广播电台前后 尹 敏 (152)

广州广播博物馆筹建记 潘健生 (173)

建设广州电视台始末 尹 敏 (183)

筹建广州电视台的艰辛历程 万人杰 (209)

忆组建广州电视台的岁月 罗远峰 (258)

广州出版事业发展史略述 高旭正 罗 初 (266)

亲历两次广州维护版权大活动 钟子辉 (281)

记破获全国第一条非法光盘生产线 张报福 (287)

广州市新华书店历史回顾 黄天骥 黎淑文综合整理 (291)

见证广州新华书店风风雨雨四十年 关玉联 (312)

在进取中《番禺报》焕发勃勃生机 吴礼彭 (324)

拓荒——《番禺日报》从这里出发 林举雄 (326)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高歌前行

——写在《番禺日报》创刊 50 周年之际 郭鉴波 (328)

从《花县报》到《花都新闻》 毕应胜 (331)

回忆创办《花县农民报》的经过 陈禄生 (334)

名闻全省的花县“两个事件”新闻真相 赖 刚 (345)

花县侨刊史话 罗文捷 (350)

《增城日报》发展简史 潘静瑜 (354)

与时俱进的番禺广播电视	杜振权 (356)
记与花都电台共同成长的日子	胡力行 (363)
花都电视发展小记	陈 英 (378)
花县农村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回顾	良 彦 (388)
增城市广播电视事业历史沿革	增城市广播电视台 (391)

杨尚昆两次为《番禺报》 题写报头记略

张云峰

熟悉《番禺日报》的广大热心读者大都知道，《番禺日报》报头四个饱含深情厚谊的红色大字是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墨宝，但很多读者也许并不知道，杨尚昆同志曾两次为该报题写报头。

据原番禺报社社长、时任《番禺报》复刊筹备工作负责人吴礼彭回忆，1980年5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同志到番禺检查工作，番禺县委书记苗栓柱请杨尚昆同志为正准备复刊的《番禺报》题写报头，杨尚昆同志得知番禺报是省内第一家复刊的县报，便欣然应允。1980年7月4日上午，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宣传部，说杨尚昆同志过一会就到宣传部为《番禺报》题写报头，要他们做好准备。宣传部没有宣纸，人事科科长霍荣谦是从文化局调来的，他主动提出去文化馆拿。杨尚昆同志来了之后，一口气写了四条“番禺报”，主办干事吴礼彭用相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瞬间。后来，报社从杨尚昆同志题写的四条“番禺报”中选了一条，作为《番禺报》的报头。

说到第二次杨尚昆同志为该报题写报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越良钊至今仍记忆犹新：

1993年2月11日，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到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视察之后，杨尚昆主席

一行在番禺宾馆的八楼就餐，当时我身为番禺市委秘书长有幸在场。杨尚昆主席看了当天的《番禺报》后连声说“办得好，不错！不错！”因为《番禺报》的报头是杨尚昆主席于1980年5月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所题，所以，番禺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报社领导都想请杨尚昆主席再次为《番禺报》题写报头。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提出了要求，没有想到，杨尚昆主席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郑重地说，回到广州后静下心来写！后来，杨尚昆主席写好了，让他的秘书通知我去拿。我觉得杨尚昆同志作为国家主席，愿意为《番禺报》重新题写报头，说明杨尚昆主席对番禺、对《番禺报》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对番禺广大领导干部以及报社全体同仁的莫大鼓励和支持。

据越良钊主任介绍，当时杨尚昆主席为《番禺报》题写的报头是四个字：“番禺日报”。因为当时的《番禺报》还是周报，因此就将杨尚昆主席题写的“番禺日报”保存起来。七年之后，“番禺日报”这四个字终于被派上用场。2000年1月1日，《番禺日报》在万众期待中迈上新的历史舞台，成为一张与读者天天见面的综合性日报。

广州解放初参加旧报馆接管的回忆

鲁 阳

广州刚刚解放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我有幸参加了接管国民党官方、半官方报社以及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商办报社。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不断萦回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一、参加广州市军管会领导下对旧报馆的军管小组

1949年10月，我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华南工作队（即华中局为准备解放华南而组建的由中原、华北、华东、东北各老解放区的部分南下干部组成的干部队）队部的成员，与其他同志一起正在江西赣州集结，等候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赣州会议）的统一部署。在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之后，我听到传达华南分局关于在解放广州后立即成立广州市军管会的决定，同时组织上宣布我被安排在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管组，准备参加对广州国民党报馆的接管工作。

1949年10月14日，我随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李凡夫等人一起，乘车到达粤赣边的粤北翁源县龙仙圩。当天下午，就听到从电报传来的广州已被我南下大军解放的喜讯。第二天，我们继续加紧随军南下，16日傍晚赶到了广州，从沙河进城，一直到达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的

新亚酒店（已被解放军进驻）临时住了下来。

10月21日，广州市军管会对外公开宣布成立。军管会由叶剑英、赖传珠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军管会内设有军事、财经、文教、交通、物资、电讯、治安、司法、卫生、供应、房屋分配、外侨事务等八委四部（处），分别负责军管工作。各个接管委员会负责分头接管原国民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党、政、军机关（包括从南京迁来的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文教接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李凡夫、饶彰风分别担任。隶属文教接管委员会的新闻出版处，处长由饶彰风兼，副处长由王匡担任（不久又由王匡任正处长、罗戈东任副处长）。新闻出版处派出由南下干部和从广东游击区以及从香港前来的干部——以罗戈东为首，由向明、姬星波、阎培涛、鲁阳、张演、杨嘉、吴柳斯等人组成的几个军管小组，分别前往广州市的各个报馆进行接管工作。

解放前夕，在广州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以及与国民党有关的报纸共有20多家，可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国民党的党报；二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报；三是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报纸；四是国民党官僚、政客办的半官方报纸；五是虽为商办，但受国民党政客把持的报纸。其中主要有《中央日报》、《中正日报》、《和平日报》、《大光报》、《西南日报》、《建国日报》、《前锋日报》、《环球报》、《现象报》、《越华报》、《国华报》等。当时这些报纸的发行量总共不超过8万份。发行量最多的《越华报》发行数也不到1万份，一般的才几千份。至于从南京迁到广州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每天发行量仅有几百份。

作为广州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派出的军事代表和军管小组成员，我们在分赴各被接管对象——旧报馆之前，抓紧学习军管会颁布的“约法八章”，一系列接管政策、方针和对北平、南京、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接管的成功经验。叶剑英特别

强调“接”与“管”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他提出：要按省、市、军队的各个系统进行分别接管、完整接管（包括财物、档案、人员）和“二快一慢”的接管方针（对政权机关和物资机构接管工作要快，而对文教、外事单位则稳妥慎重，晚接收几天也无碍，但是对广播电台、报馆则要马上接管）。

按照叶剑英关于接管工作的指导思想去进行接管工作，在广州市军管会公开宣布成立的前三天，以罗戈东为军事代表的军管小组首先进驻光复中路的中央日报社，把机房的机器接管下来，供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于10月23日开始出版时印刷使用。《南方日报》出版前六天，即10月17日，军管小组对国民党的广州广播电台进行接管，并在第二天，以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义（后改名为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广播。

二、接管旧报馆的物资、档案、人员

我是在10月22日与姬星波、张演两人一起，作为军管小组的成员，由几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陪同，前往设在光复中路的西南日报社进行接管工作的。我们一到报社大门，就把广州市军管会“约法八章”的布告张贴在门口的墙上，并入内召集全报社工作人员开会，宣布从即日起停止该报出版，并从即刻起由军管小组开始接管该报所有的房屋、机器、设备、文件、档案、财产、人员，要求报馆内所有人员都得协助接管工作顺利进行，切实保护报馆所有物资、档案等不受损失。

在我们进入西南日报报馆之前，即在广州解放的前几天，该报和广州市内的许多报馆一样（除中央日报外），都继续出版（这与国内其他许多大、中城市情况不同，因为这些城市的国民党报馆或与国民党有关的报馆都在解放军入城后立即自动关门倒闭了），但他们的口气都改变了，如过去把解放军称为“共匪”和“匪军”的，已经改称为“解放军”和“共军”了。由于他

们对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很不了解，所以在报道消息时，出现不少错误，竟然把我们这些南下干部称为“中共青海军政大学”的师生，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外公开使用的代号为“青海部”，这些旧报馆的编辑、记者就随便乱猜乱写了。

广州的这批旧报馆设备一般都较陈旧、较低劣，但对他们进行接管时，首先要把这些设备都清点、保存下来，勿使遗失。记得在接管时，军管小组就发现地址设在光复中路的中央日报社内一台印刷机日前被人转移到别的街道去了。我曾与军管小组的一位同志乘车去追寻过。西南日报社的印刷机器比较齐全，因此我们把它完整地接收后，不久便奉军管会令，连同该报社的印刷厂职工一起，全部移交给从中共北江地委派来的代表梁木，由他带领将其带到韶关供新开办的北江日报印刷使用。其他许多已经接管了的旧报馆（如大光报、建国日报等）的印刷机器设备，也陆续交给了新成立的南方人民印刷厂和新华印刷厂使用（接管下来的报馆印刷厂职工也随之成了这些新印刷厂的成员）。越华报等报社的印刷厂经过赎买后，1950年8月下旬也开始成了由广州地区各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报——《联合报》的印刷厂。1952年《联合报》停办。该报社的印刷设备移交给同年12月1日创刊的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使用。

当时接管下来的旧报馆设备，除了一些房屋、印刷机器外，其他的设备都少得可怜。尤其是报社的资料室几乎空空如也。记得我参加接管西南日报之初，曾经想向该报社的图书资料室借阅一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却无法找到。作为国民党内孙科派系主办的报纸——西南日报的图书资料室，连这本号称国民党指导思想、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主要著作的《三民主义》一书也没有，岂非笑话！？

这个资料室藏书极少，但却存有几份香港报纸。我记得，就在我到该室借书的当天，偶然发现，在当月（1949年10月）香

港报纸上刊登了一条令我震惊和悲愤的消息：原来我在浙江大学求学时的老同学、老战友罗卓才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竟在台湾省基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他在刑场上英勇就义时高呼革命口号，表现得非常壮烈！当时我热泪盈眶，在旧报馆资料室陌生人面前，生怕流下眼泪来。

我进入西南日报社后，就住在报馆里面，经常和报社内的人员见面、谈话。因为互相逐渐熟悉起来，所以报社的一些人员也愿意和我接近和反映情况。我从一些编辑、记者那里了解到，该报在停刊前惯于刊登一些社会新闻，并以此吸引读者。此类新闻五光十色，内容复杂，却常常违反新闻真实性。如曾经登过一条有关广州市西关的新闻，内容非常离奇，但事件发生的日期、地址都非常具体。如某月某日在西关某街道某号住宅等。其实这条消息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它所描述的地址——某街道某号，这条街的街名是存在的，但“某号”却比该街所有住宅的门牌号码多了一个数字。这样一来，假消息就成了骗人的“真新闻”，除非有心人去当地调查才会弄清，社会上大多数读者都会上当受骗。这是《西南日报》惯用的伎俩，也是当年许多反动报纸干的习以为常的勾当。当时我听了感到十分新奇，但后来细想，就把诸如此类的情况当作增加对旧报馆采编工作的了解罢了！

三、开办以旧报馆新闻从业人员为对象的学习班

在把印刷机器和其他设备接管下来之后，军管小组就开始了。对采编人员和经管人员的集训。当时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把各报社的上述人员集中起来，在原西南日报馆开办了一个学习班，我负责主持。该学习班由各军管小组的一些同志讲课，讲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在学习班上作了“人生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的报告，内容大意是：究竟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产

阶级、地主阶级服务，还是为中国广大人民服务？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当时我虽只有 23 岁，但在这么一群老、中、青都有的旧报纸工作人员面前，却侃侃而谈，一点也不胆怯。因为我认为，我是中共派遣前来公开讲演的，我坚信所讲的这一问题，是人们应当弄清楚的，为人民服务是应该共同恪守的真理。事后几天，我听人说起，在香港有一份亲国民党的反共报纸，竟刊登了一篇题为《广州新闻界集中营铁幕》的通讯，胡说中共在广州设有一个新闻界的集中营，专门向广州新闻界“洗脑”，集中营的头目叫鲁阳。我找到那篇造谣文章看了，看后令人既好气又好笑。我们军管小组的同志们认为，这篇文章肯定是这个学习班中的人写的或是提供材料给别人编造的。但当时一下子难以查出这是谁的“作品”，也就算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这个学习班开办不久，我就参加了 11 月 11 日在广州举行的 30 万人参加的庆祝广州解放大游行。当天军管小组率领学习班的学员参加游行归来，大家情绪高涨，表现出学习班的大部分学员对广州解放的欢欣拥护之情（尽管班里仍有少数人或个别人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怀着不安心理甚至仇视情绪）。

经过 30 多年，到了 1980 年初，我在广东某报社的联欢会上，碰到了一位陌生的老编辑。他问我：“您认不认得我？”我说：“记不清了，请问您是谁？”他微笑着回答：“您在 30 年前，曾经批评过我，这事情您还记得吗？”他这一提醒，我才记起一件事：在 1949 年 11 月 10 日，我通知接管了的新闻报馆人员的学习班所有学员都要准时在第二天回报社集中一起前往参加大游行，不可迟到缺席。可是到了那一天，竟有一人缺了席。事后，我质问这位学员为什么要缺席，他竟不以为然地说：“我欢迎和拥护广州解放，但不一定要参加庆祝游行，因为游行不过是一种庆祝形式而已。”我当众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说：“举行庆祝广州解放大

游行，正好是广大广州人民热烈欢迎和拥护广州解放的心情在内容和形式上两者的高度统一，你怎能把它贬低为只是一种形式呢？”事后，我也没有继续对此事进行更多的追究。没想到，这位编辑把我当时那番批评竟深深地记在脑海里，一直“保存”了几十年！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只要自己出发点好的，对一些错误观点及时地进行适当的正确的批评，未尝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的思想认识问题的一种好办法。

在学习班开办期间，对参加学习的人员都发给伙食费。学习结束以后，军管小组根据掌握到的学员情况，有区别地对他们的去向进行安排。有的继续留用（安排到一些单位），有的被分配到革命大学和有关训练班继续学习，有的则进行遣散（发给相当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本来，按照军管会的政策规定，对一些罪大恶极或怙恶不悛的反动骨干和特务分子可以逮捕，审查处理，但直到该学习班结束时，都没有逮捕过一个人。那些被继续留用的和安排继续学习的人，大部分是思想较好和工作能力较强、素质较好、具有培养前途的新闻界人士。他们通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

四、接管旧报馆过程的一些体会

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努力，广州市军管会接管旧报馆的工作告一段落。由于新的工作需要，我被组织上正式调到华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从1950年1月起，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在我撰写这篇回忆录前夕，曾拜访过阔别已久的一位党的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战线老战士，离休已久的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罗戈东同志。50多年前，他曾经在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担任过领导工作，并和我们一起到过旧报馆进行接管。在交谈中，我们互相谈到了当年对旧报馆的接管过程的三点体

会：一是军管小组不折不扣地认真贯彻执行军管会制定的接管政策。如在接管旧报馆时，区别对待，严格区分一些报馆的后台老板究竟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决定对他们的报馆资产是否没收。当时军管小组接管了越华报馆之后，立即审查其资产来源，保留其商办资产股份，没有对它宣布全部没收。二是军管小组切实依靠工人群众，抓紧准备恢复生产。进入各个报馆的军管小组都立即向所在印刷厂的全体工人讲明来意，解释党的政策，把印刷厂的机器设备逐一点收后，便抓紧安排恢复生产事宜，从而及时地发挥了各印刷厂的人力、物力的作用。三是军管小组成员坚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作风，为被接管报馆的所有人树立榜样。在进入旧报馆之前和之后，各军管小组所有成员都反复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要求务必保持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的作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功臣自居、停滞不前、贪图享乐的思想；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因此在接管过程中没有人乱纪违法和出现严重错误，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接管任务。

(2002年10月)

(作者是原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原省政协委员。近20年来，一直兼任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审查委员；先后担任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顾问)

吴有恒与复刊之初的《羊城晚报》

鲁 阳

《羊城晚报》是中共广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党报，也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中共创办的第一份晚报，创刊于1957年10月1日，是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倡议支持，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的具体指导下，由南方日报社黄文俞、李超、杨奇等人负责筹备出版的。从创刊之日起，在各个方面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开拓出一条办社会主义晚报的路子来。从1961年2月1日起，中共中央中南局决定把《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合并，使《羊城晚报》成为广州市委的机关报。1965年7月1日，中南局又决定将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复刊，《羊城晚报》改由中南局直接领导，成为中南局的报纸，《羊城晚报》的办报方针是：既要有晚报的特色，又要起中南局指导工作的作用。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发生，同年9月1日，《羊城晚报》改名《红卫报》，同年12月13日，《红卫报》被广州地区造反派强行封闭。从此，《羊城晚报》一直停刊了11年。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广东省委于1979年11月决定复刊《羊城晚报》，派调吴有恒、许实、何军、杨家文、鲁阳五人组成筹备组，并分任正、副总编辑。1980年2月15日，这份由广东省委直接主办的晚报正式复刊。《羊城晚报》创刊时的报头由陶铸题写，复刊后《羊城晚报》的报头改由叶剑英题写。《羊城晚报》从创刊、停刊到复刊这段